

钱穆先生著作系列

中国史学发微

〔新校本〕

钱穆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錢穆

钱穆先生著作系列

中国史学发微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史学发微 / 钱穆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2. 6
ISBN 978-7-5108-1472-3

I. ①中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史学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K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82224号

中国史学发微

作 者 钱穆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 9.875
字 数 196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472-3
定 价 28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

钱穆先生

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
物來不亂物去不留

錢穆



钱穆先生书法

新校本说明

钱穆先生著作简体新校本，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出版，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编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繁体版为本，进行重排新校，订正其中体例、格式、标号、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，内容保持《全集》版本原貌。

《中国史学发微》括有十三篇文章，初编于1987年，原收文十四篇，1989年在台北出版。其第三篇《史学导论》系根据先生在台湾成功大学所作四次演讲之讲词润饰而成，并曾于1970年出版过单行本。第十一篇《庄子薪尽火传释义》先生生前已移入《庄老通辨》一书中。

九州出版社

序一

中国学业相传，向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经学最早，但实惟有《诗》、《书》两部。《诗三百》迄今犹存。《书》则惟商、周两代少数几篇政治文件，或最先当起于盘庚以后。至唐、虞、夏代，如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之类，皆出战国后人撰写，非孔子前所有。至于礼，《论语》：“子所雅言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。”则礼非成书，故称“执礼”，与《诗》、《书》不同。《仪礼》仅属士礼，乃孔子以下人所造。《周官》更属后起，当在战国之晚世，或当在《虞夏书》之后。乐则无专书记载。即孔子时，郑、卫之声，已非古乐。孔子在齐闻《韶》，《韶》乐乃自陈达齐，但亦决非传自舜代。惟在孔子时，已属南方之乐之稍古仅存者。至孟子时，古乐、今乐已显相分别。《易》虽古代相传，但孔子时亦仅为一卜筮之书。《易传》则当出秦始皇时代，已杂采儒、道两家义成书。孔子前虽有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亦不称之为“经”。盖古代学术尚未流通，惟政府最高层始掌有之。故孔子曰：“春

秋》天子之事。”

学术传于社会下层，其事始于孔子。战国诸子著书，墨家最先有经。汉代诸儒以孔门相传有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“六艺”之学，遂误称“六经”。而实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易》及孔子《春秋》，只五书，尚缺一《乐经》。汉武帝乃立《五经》博士。后代经学惟《五经》有传记注疏，此外不再有增。则虽有经学之名，而其学术相传，则惟传述，无创作，与史、子、集三部有不同。

先秦诸子相传为九流十家，最先起者为孔门儒家。孔子为中国自古相传私人讲学之始，前后门弟子共七十七人，后世讹称七十二人。然姓字见于《论语》者，不达半数。《论语》乃孔门师弟子相聚讲论语言之记载。然其书相传，至孟子后，始正式编纂为上下二十篇。故在《孟子》书中，亦尚不见《论语》一书名。墨翟继孔子而起，但墨家先有成书。如今传《墨子》及《墨经》，其书皆出《论语》为书行世前。其他各家成书，则全出儒、墨后。但独有小说一家，则其成书当尚有在孔子之前者。

九流各成一家之言，以其门弟子相聚相传，如同属一家，故称“家言”。家族之“家”，指血统言。诸子成“家”，乃指其所讲贯之道统言。独小说家则不然，因小说家所汇集之诸书，尚远起在孔子儒家讲学之前。古代有史官，由周天子分派于列国诸侯间，世袭其位。又有正史、稗史之别。“正史”居诸侯之国都，“稗史”则散居国都外城乡间。其有关稗史所记载之文字，

散见于今传《左传》诸书中者，尚不少。余已在他篇论及，此不详。战国小说家言，则即由其时之稗史来。

如是则在子学中，岂不即包涵有史学？其实不止于此，即如纵横家言，岂非即战国时代有关当前国际事件一种互相分派之争论与抗议？其实尚不止此，即如孔子为儒家开山，但“甚矣，吾衰也。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”，又曰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则孔子之意，乃欲上承周公。后儒则又自周公上推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唐、虞、三代。墨翟继孔子起，自为家言，则曰：“非大禹之道，不足以为墨。”是墨家于唐、虞、三代中，独取夏禹一人为法。道家继儒、墨而起，乃更上推黄帝，而唐、虞、三代皆在其下。但又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，创为农家言。其次如阴阳家，则庖牺氏、神农氏、黄帝、尧、舜以至三代，凡中国史历古相传诸帝王，皆在网罗取法之中。而秦之统一，则其君自称始皇帝，是亦上承杂家吕不韦《春秋·十二纪》来。则凡先秦诸子学，实可谓乃无一而非源自史学。

此后汉代史学继起，其太史官司马谈讨论六家要指，而私意所宗，则更在道家。其子司马迁继之，乃益尊儒家，故既为《孔子世家》，又作《孔子弟子列传》与《孟荀列传》，于诸子中最为特出。其《自序》则曰：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。”是史迁之为史，亦求上承诸子立言成家。则子、史之学，自古人视之，其间实无大分别。此后《二十五史》以及《三通》诸书，乃亦如诸子，各成家言。

尤可以宋代之欧阳修为之例。如此中国之子学与史学，岂不貌分而神合，可离而可通乎？

再次言及集部。集部有骈、散之分。最先骈体肇始于屈原之《离骚》。《诗》、《骚》并言，则《离骚》亦可谓乃上自经来。太史公以屈原与贾生并传，贾谊《治安策》乃汉初一名奏议，则《离骚》岂不亦可通于子与史？其下乃有三国时代之建安文学，乃始由西汉自《离骚》转为骈体辞赋，又转入散文中来。如曹操之奏议诏令，皆可纳入文学之集部。诸葛亮《出师表》，亦入集部。实则此等文字，皆亦子亦史。又如晋宋时代之陶潜，其所为诗辞传记，如《归去来辞》，如《桃花源记》诸文，皆即其一人之史，亦即其一家之言，岂不史与子与集之三部，实可通而为一乎？

唐代韩昌黎唱为古文，乃始正式由骈变而为散。其自言：“好古之文，好古之道也。”则其言亦子亦史。一人之集，至少乃为其一人之自传，亦即当归入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道统中。故集部兴起，乃为四部之最后。其实古代之经，如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尤其如《古诗三百首》，岂不亦如后代文学一集部？亦可谓集部即是子，但较单纯而已。而其当可列入史部，则更不待论。是则中国四部之学，其实约略言之，只是子、史之两部分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又与其门弟子所言合成一《论语》。《春秋》经而即史，而《论语》是子，但亦可称为一集部。是则孔子一身已兼有了四部之学，故后人尊之为“至圣先师”。

此下于四部之学最有完整成就者，当推北宋时代之欧阳修。

其生平著述，可谓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皆备。如其为《新五代史》，乃史部之正宗。又兼修《新唐书》，亦入《二十五史》中。而其于经学，皆有成书。其于《诗经》方面姑不论。其于《易经》，疑《易传》非孔子之作，此乃自孔子以来，一千年后始发其议。欧阳子自谓再历一千年又有第二人，两千年可得第三人，三人为众，则此一人所疑，二千年后，即当成为众人之所疑矣。此其运思持论，何等高明而广大，悠久而深沉。可见由一人之学而成为家学，由一家之学而成为千古之群学，即道统所存，即于欧阳修一人之身，亦已明白曝露无疑矣。

又欧阳修之文，上承韩愈。而其辟佛，则成为《本论》。以一人之所疑、所反对，化而为全国之政教，此即由集为子一明证。故由欧阳一人，而中国四部之学之可得达成于一家，亦即明白可证矣。

余此书专为史学发微。苟其人不通四部之学，不能通古今之变而成其一家之言，又何得成为一史家。上之如汉代之司马迁，后之如宋代之欧阳修，皆可为明证。惟孔子则尤其为至圣先师，为一切中国学人之最高楷模。此则治中国学术，皆当以此为法。此非空言，乃实际标准之所在，则尤贵学者之能深思而明辨之。心知其意斯可矣，又何贵于繁言与空论。

一九八七年一月钱穆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

序二

西方人重空间观，但缺时间观。古希腊人即有几何学，作航海测量之用，但几何学非以测时间。中国古人，则立标测日影，即知重时间。又曰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雄鸡司晨，亦以测时间为重。

阿拉伯人有《天方夜谭》，其间有“能言鸟”一故事。三兄弟同求能言鸟，两兄已失踪，其弟继续追求。一术士告之，循山路上行，路旁有呼声，勿回顾，则能言鸟易得。其弟乃塞耳上山。路旁丛石耸立，呼喝不已，愈上则石愈多，声愈大。其弟因已塞两耳，幸能终不回顾。竟得能言鸟所在，取之以归。路旁石皆起立重得为人。盖皆来寻能言鸟者，闻声回顾，遂化成石。此亦如人读史，过重以往，乃随前人过去，亦如失败，无以向前。历史乃前人一切以往故事，可称已均属失败。回读史籍，亦如人重蹈覆辙，自陷深渊，重归失败。能言鸟故事即此意。古希腊滨海而居，非出国渡海，远向他邦，即无以经商，

亦即无以为生。阿拉伯人居沙漠中，非渡越此沙漠，生命亦无前途。故此两种人，多主向前，不重回顾。历史故事皆属以往，非彼辈所当流连。

耶稣则犹太人，其创始宗教，乃谓人生从天堂降谪，死后将重返天堂，俾得安居。恺撒事恺撒管，历史则属人间事，全属恺撒，为上帝所不管。信奉宗教，自不留心历史。

西方文化会合此轻视历史之三大渊源，遂无史学可言。

中国人则谓：“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”前人随时过失，后人即当警戒。并且前世以往亦并非无成功之处，亦可资后人以承袭与模仿。历史教人向前，即因其能知过善改，亦因其能善所承袭。西汉人言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。”其时则中国历史已历两千年以上，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以迄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，以至秦汉，一部两千年以上之历史，岂不告人以人类已往，历史有得有失，有成有败，使人知所警惕，有过能改。则过而常存，去而复来，乃得依然向前。人生遂能发出前所未有之聪明与措施，而改善其将来。如此则历史所记乃人道，实亦即天道。人类智识贵在此不断过程中，求获将来之新得。故曰：“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。”如人一日三餐，有排泄，但亦有存留。惟其所存留已非故物，因谓之“化”。化则非属过去，故曰所存者“神”。庄周言：“万物一也。是其所美者为神奇，其所恶者为臭腐。臭腐复化为神奇，神奇复化为臭腐。故曰通天下一气耳。”是则历史非尽属过去，乃成一种神化作用。西方人轻视历史，则过去尽成臭腐，如希腊，如罗马，乃至如近代之英法，不久亦当全成

为臭腐。而中国则上下五千年通为一体，尽成神奇。此岂西方之所有。人文学中之史学，其功用乃如是。

《易》言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必经以往过失，始得继续生存。孔子曰：“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”过去与将来，即属人生之两端。当前现在，则是其中。历史可贵处，即在其属于过去之一端。不断过失，实亦为不断存在之前因。即在此过失中，求一不断之向往。倘尽放弃其一切过去于不顾，则此端既不存在，亦即无其他一端可言。既无过去，亦即无将来，更又何从寻得一向前之生路？中国人言“死生”“存亡”，此即两端。不死又何有生？不亡亦何有存？

中国人又言“道”字。道即一条路，向前一步，则失去了其走过之一步。其实就其不断向前言，则一步过去，亦即是一步完成，但当求前途之所止。而人生无穷，则其前途亦无止。故步步向前，非只是步步过去，实亦是步步完成。人类历史正如此。司马迁引《诗》以赞孔子曰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之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”此见人类远大成功之一境，亦即无可至、不能止之一境。而“景行行之”之逐一步骤，则亦尽在逐步向前之途上。即过失，亦进步，同时亦即是完成。此则中国之历史观。

余尝谓人生即历史。人生之最要过程在能知过勿惮改。历史亦然。孔子时时梦见周公，但其老年则曰：“甚矣，吾衰也。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周公在孔子当时，实已成为一过去人物，亦可谓一失败人物。倘周公不过去、不失败，则周室亦不

东迁。故孔子又曰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则孔子已知周公当年之道不复可行于孔子之时矣。孔子又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。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”此亦如周礼能言，而鲁不足征。其言不足征，即犹言过去之亡失。但亡失者乃其事，非其道。又曰：“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。”杞、宋不足征，即夏、殷两代已在过失中。鲁不足征，即周公与西周亦尽在过失中。其或继周者，有继周而起，此即“自古无不亡之国”之先声。历史在过去中，乃指其事，非言其道。而人生则贵在有将来。但非有过去，又何得有将来？是则历史即人生，但可谓乃指其前一半之已过已失言，非指后一半常存常在之将来言。而将来之可知，则即在过去中。虽可知而不可知，虽不可知而仍可知。此则读史而明其道乃可知。故人道即天道。

当前之中国，或可谓孔子已先知之。所以孔子往日之所言，至今仍有可用。以今日世界之情况言，亦可谓早在孔子之预见中。然而孔子之在今，岂不亦已成为一过去人物？孔子之所言，迄今已两千年，早已过去，又岂得一一有用？是则贵在传孔子之道者，斟酌而善行之。果尚求为东周，则尽人而明知其非矣。但此孔家店，则仍然不得打倒。此则当前之中国人，又谁孰能深识其意旨之所在？

知过去乃知将来，知亡失乃知存在。西方人不肯认有过，又不喜言亡失，故不爱言历史。其所言之历史，则尽属成功一方面，如言希腊史、罗马史，以迄于最近之英法史，当前之美苏史，莫不皆然。使人仅见有当前之形成，而不见有以往之过

失。则试问个人人生又焉得仅有生存，而无死亡？西方之耶稣教言人死仍有灵魂上天堂，则正是此义。

中国人贵能知过，又贵能改过，故其言历史亦常在言人生之过失处。知得人生已往之过失，则亦易知当前及将来之所得完成。西方人则仅知此一端，不知彼一端。如罗马人，仅言己是，不言希腊人之过失处。现世英法人亦仅言己是，而亦不言以往罗马人之过失处。即如当前之美苏，亦仅能各言己是，而不能言英法已成过去之一切前非。但美苏自己不远将来，亦将自陷于过失中。故西方乃终不能有其如中国般之史学，乃使其人生常陷于过失中，而不能自拔。

孔子言：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孔子仅生七十二岁，但至七十始能从心所欲，而不见有过失。则其前七十年，岂不亦常在过失中？故孔子“学不厌”，即学求其少过。但中国亦仅有孔子一人为至圣先师，则其他人亦尽不如孔子，斯其毕生多过可知。学史功夫即在知过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试问《春秋》两百四十年，又谁一人能在无过中？孔子称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然又曰：“管仲之器小哉。”则虽管仲，又焉能无过？故历史多过，学史在求少过，直待天下太平，始为至善可止。则试问何日能达？故孔子之门人言：孔子之死，亦仅孔子之休息，尚待后学继起，续加努力。西方人只认各有长处，并日在进步中，此乃西方人之历史观。今日国人慕之，不论是非，不问过失，惟知求变求新，日趋进步。即如原子弹发明，亦是一进步，并是一大进步。但不仅不问进步之所止，亦不问进步之

当前实况究如何。此为中西双方民生精神之不同，此即其既往历史，亦宜无可相同矣。

中国人言“鉴古知今”，西方人则贵开辟创造，求变求新。即当前之美苏，又当变，又当新。但新又如何？则非当前之所知矣。

又西方人重多数，故其历史亦惟重多数。而在中国则惟少数人能入史，能为历史人物。西方人既不重历史人物，乃有无历史人物，但只惟变惟新而已。故西方人论新旧，中国人则重褒贬。又少褒而多贬，即新亦可贬。又孔子前人言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为“三不朽”，但孔子则并此而不言，乃惟言一“学”字。过往历史，即在其所学中。而西方人则曰：“吾爱吾师，吾尤爱真理。”师则可在历史中，而真理则多在历史外。故西方不重有史学。此一大要端，亦诚不可不深论。

今日国人好骂中国史，谓其全属过失，毫无进步。以另一观点另一角度言，此亦庶或有当。西方人因贵多数，多人所是即为是，多人所得即为得。时刻在求得中，此正当前西方民主社会乃有此，诚亦当前一史实。中国则重己重少数，孔子曰：“知我者其天乎！”又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！”但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当为中国史学之开山，则宜其难为今日国人之崇慕西化者言之。

今日国人读中国史，亦必稍知中国之传统文化为如何。希读吾书者，其亦深思之。今试再易辞言之，中国人惟知爱重历史，故能蔓延扩张，以有今日。西方人只为不爱重历史，乃日